

浅议陶渊明的作品与其心态的联系

舒 楷

(东宁县文化馆 黑龙江 东宁 157200)

【摘要】无数历史事实证明,与文学创作联系最紧密、最直接的因素是作者的心态,而一个人的心态作为特定时代背景、特定生活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不稳定、不定形的心理情绪状态,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定着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。分析陶渊明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文,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其心态变化。

【关键词】陶渊明;作品;心态

中图分类号:A14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007-0125(2015)01-0178-01

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日益土崩瓦解的时代,是老子无为思想和儒家君臣伦理观念相糅合的玄学盛行的时代。但玄学思想并没有窒息艺术创作的生命,陶渊明的诗不仅填补了东晋一百多年诗坛的空白,而且形成了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。他除直接咏古来抒发自己的壮志,隐约地讽刺时事外,更提出了朴素自然的诗文创作主张。我们看一下《读〈山海经〉》十三首之二:

“玉台凌霞秀,王母怡妙颜。天地共俱生,不知几何年。灵化无穷已,馆宇非一山。高酣发新谣,宁效俗中言。”这首诗是针对当时文风而发的,诗人通过赞扬周天子与西王母会饮于瑶池,西王母所作歌谣的词意古朴自然,没有世俗之言,对当时文坛无景无情、浮薄无味、充满绮靡之风的玄言诗予以否定。可以说,《读〈山海经〉》之二表达了陶渊明对诗歌的表现手法、艺术风格、思想内容等的全面探索与主张,这种探索与主张反映到他的诗文创作中,最突出的一点就是:他别开生面地把田园山水、田园生活引进了诗歌,写了许多优秀的田园诗。这些田园诗描绘了田园景物及田园生活劳动的情景,平易自然,韵味隽永,开一代诗风。

如果说,通过作品可以了解陶渊明的文学主张,那么,通过作品,我们同样可以大致把握其心态从出仕至归隐的渐变过程。其实,青年时代,陶渊明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抱负的。“忆我少年时,无乐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,骞翮思远翥。”(《杂诗八首》)这种超越四海的远大志向在他的诗作《命子》中流露出来。诗中,他热情地赞美了一些功勋昭著的贤臣,如辅佐夏朝的御龙,辅佐商朝的豕韦,辅佐汉高皇帝的开国功臣陶舍等人,婉转地表达了他辅佐明君、立业兴邦的政治意愿和济世救民、修善立名的入世思想。但可悲的是,当时东晋腐朽的士族统治集团让他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。从公元

393年至公元405年,他时而出仕,时而归隐,既在和东晋王朝对立的桓玄手下做过事,又在当时还拥戴东晋的刘裕手下当过官。总之,十三年间,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断尝试,不断失望,终至绝望。于是,他决定辞官远离浊世,独善其身。他心态的改变从他诗文中可见一斑,如:作于公元405年的《归去来兮辞》抒写了诗人厌恶仕途生活,宁愿归隐躬耕,享受田园生活的情怀,反映了诗人厌恶世俗生活、回返自然的人生观,是一首标志着诗人出仕生活结束、归田生活开始的名作。又如作于公元406年的《归园田居》五首也充分表达了诗人归隐的志向和归园后的欣喜心情。作于晚年的《饮酒》诗中“遂尽介然兮,终死归田里”的句子,更是诗人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,最终走上归隐道路的最坚决的宣言。《饮酒》整组诗中(20首)处处体现了诗人清高自洁的品格,表达了诗人对门阀士族的鄙夷。其中传诵最广的第五首最具代表性:“结庐在人境;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。”短短数句,诗人当时的心态便一览无余了。

事实上,陶渊明归隐田园后,并非一味地寄情山水而绝对地不理世事。归隐后,诗人诗文中反复出现“东户”、“羲农”、“羲皇”等远古人物,这标志着他的政治观、历史观已渐渐远离了孔孟之道,他对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想法与追求,他的这种心态最集中地体现在《桃花源记》和《桃花源诗》中。在《桃花源记》中,诗人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、没有官府与剥削、人人劳动、丰衣足食的人间乐园。尽管诗人这种乌托邦思想具有一定的狭隘性,但终究反映了当时人们用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,表达了诗人对当时封建社会贫困和动乱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,深寓讽谕意义。